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

付祥喜

内容提要 近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普遍存在“窄化”现象，其焦点和核心聚集在三个方面，即：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以资料替代史料；研究选题偏重理论且雷同重复严重；研究方法上认为文学史料研究是纯粹的考据式，不包括甚至排斥文学批评。面对这三个方面的“窄化”现象，我们应该把握好“窄化”的度，既要认真对待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也要警惕其“泛化”。

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料；窄化；透视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俨然成为热门课题。不但以“当代文学史料”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机构^[1]。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讨论，更是聚讼纷纭，有些学术期刊为此开辟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专辑”“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专栏^[2]。各家观点，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有赞有弹，可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很多人谈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首先会把它“窄化”(narrowing)。“所谓窄化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躯体感觉、认知、情感或思维意识向某一方面或某一方高度集中，使其所及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收缩，越来越局限的过程。”^[3]“窄化”现象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普遍存在，但并非没有焦点和核心。本文拟从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选题、研究方法这三个方面来透视分析“窄化”现象。

一 史料搜集整理以资料替代史料

就史料搜集整理的意识而言，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存在明显差异：“前三十年”几乎不存在有意识的史料搜集整理，而“后三十年”则是自觉的史料搜集整理。

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虽有零散的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但由于诸多原因，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新

民歌运动”旗帜鲜明号召“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4]，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然而，所收集的“新民歌”大多临时写成，很多都是概念化的宣传口号，艺术价值有待商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少数民族史诗整理，比如对彝族史诗《阿诗玛》的整理，就是一次搜集整理文学史料的成功范例。当然，在“前三十年”，并非所有搜集整理民歌的行为都是迎合“新民歌运动”，不能排除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自发的行为。“民间史料收藏者”赵一凡在特殊年代保存大量“地下”文学资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编辑整理《天安门诗抄》，等等，都属于有意识的文献史料搜集整理活动。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只是民间收藏者的个体行为。作为来自民间的普通读书人，他们不可能也无法完全逾越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就使其文献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难免“窄化”——基本上都是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诗歌，对于小说、诗歌之外的“当代文学”如杂文、戏曲、民间故事、纪实文学等缺乏搜集整理。

较之诗歌文献，还必须提到“前三十年”两种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一种是文艺运动史料汇编。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文学史料相比较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当代文学史料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往往集中反映在文艺运动。因此，与文艺运动有关的文件、政治报告、领导人讲话、批示，都是重要的文献史料，它

们一般保留在当时中央报纸与杂志等机关刊物上,有些以汇编或单行本形式印行。另一种是响应文艺运动的材料,它们以文学思潮汇编或批判材料的形式被编辑、整理、收录。这两种无疑是当代文艺运动的重要史料,但它们只是从正面反映文艺运动。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文艺运动,尤其卷入运动的作家真实情感、心路历程等,还得依靠文艺运动期间的内部刊物和包括作家日记、书信、自白书、检讨书等在内的私人文献。在“前三十年”,这些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是严重缺乏的。就此来看,即便“前三十年”搜集整理数量最多、最常见的文艺运动史料,也存在偏执于公开文献而疏于内部刊物和作家私人文献的“窄化”现象。

“相比较于前期的零散、混乱、变形,从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樊骏)。”^[5]“后三十年”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成果主要以综合性的史料汇编为主,同时,在现存史料收集、整理与辨析方面,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5]纵观这些史料搜集整理成果,容易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以资料替代史料,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被窄化为当代文学资料搜集整理。这种现象,在大型综合性的史料汇编中最普遍,例如全套一共200余种、已出版80多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小说学会主持编选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孔范今等总主编的那套《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分甲、乙两种,共24册),等等。

在文学研究中,尽管资料与史料都承载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往往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但作为学术概念,其实二者区别很大。首先,史料直接反映史实,资料只能间接反映史实。史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遗留的痕迹,有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之分。一般所称史料,主要指第一手史料,即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资料是经过后人运用第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其中夹杂了后人的思想观念,只能间接反映史实,属于第二手史料。例如,未出版的作家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都属于作家史料,而依据它们产生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只能是作家研究资料。其次,

资料是与研究对象建立了某种关系、确定了某种用途的材料。与史料相比较,资料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目的性,它为了某种研究方向、研究目的而存在。史料则既可能已经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也可能尚未与研究对象建立关系。由此,史料包括有用的和无用的,资料必须有某种研究用途。就此两点区别而言,不但资料不能替代史料,甚至多数时候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有学者把“能够构成文学史内容的材料”称为文学史料,“不能构成文学史内容的材料”称为文学资料,“文学史料是构成文学史文本的主材,文学资料是文学史的边角料”^[6],这种区分是有道理的。也许有人以为,“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以当代文学史料为主,只不过书名写为“资料”而已。我们不妨以几种大型“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为例,看看事实是否如此。2018年出版的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共16册,经笔者粗略统计,每册当中研究论文占十之八九。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之一是:“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7]。“主选论文”指的是全文收录的研究性质文章,而“资料索引”是各时期相关论文目录。2014年出版的魏建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总共20册,每册副标题均有“史料辑”或“文献史料辑”字样,而所收文献却以“研究文献”即学术论文为主,有的分册全是学术论文,如《文学历史的跟踪——198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史料辑》。再看一种规模更大、影响深远的,即200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孔范今等总主编的那套《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它把1970—2010年间近30年的文学思潮、流派、文体及代表性作家的有关学术论文汇编整理,最后附录相关研究成果的目录索引。这套书,“严格意义上是‘资料’而非‘史料’”^[8]。这套书的出版说明也明确指出甲种、乙种都是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不仅于此,严格地讲,迄今为止许多当代文学资料汇编都是当代文学论文集或论文目录汇编。对于资料汇编中可能存在的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范围“窄化”的现象,应该引起警惕。

资料何以成为史料?除了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

的概念误读之外，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受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长期存在以资料覆盖史料的影响。最早以资料覆盖史料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58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这一套丛书以“资料”为名，实际上收入的几乎都是现代文学史料，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现代时期红色刊物《巴尔底山》、左联机关杂志《前哨·文学导报》等。为弥补丛书不足，1962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创办《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等各方面的回忆、访谈、调查、整理、选辑、编目、考证等各类资料，及与此有关的文章”^[9]。这“一书一刊”具有较大的前瞻性和较广的覆盖面，影响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现当代文学史料汇编，大多承袭其侧重报刊史料的选文思路，在名称上也几乎都冠以“资料丛书”“研究资料”。

第二，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品格所致。资料和史料虽然在概念上有区别，在整理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倘若置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视野之中，两者的界限则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因为，当代文学虽然已经走过70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却是一个具有明显“当代性”，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充满各种理论观念和学理性论争，有的至今仍未停息。比如，当代文学的可靠性一直让人疑惑和担心，“当代文学”的概念直到近年仍有学者提出质疑。承载各种理论和论争的论文著作，于是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譬如，当代文学史只要提到“朦胧诗”，就绕不过谢冕、徐敬亚、孙绍振为朦胧诗辩护的“三个崛起论”。同理，“寻根文学”不能不提及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寻根”》。这些论文，既是相关文学史的研究资料，也是重要史料。类似这样的“资料”和“史料”交叉重叠，在当代文学并非个别现象，长此以往，容易让人忘记或忽视二者的区别。

第三，几乎所有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者都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为突显个性，大多按照自

家学术观点和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来遴选编排材料，以致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基本甚至可以说都能转化为“史料”。如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虽然“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其编选行为却被视为“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料整理的工作”。编选原则方面，程光炜强调：“主选论文，应以当时文学思潮、论争文章和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编选对象”^[10]。哪些是“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编选者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很可能不同。这套丛书的编选者皆为相关领域专家或青年才俊，而书中选文，既有学界公认的重要文献，也有一些明显缘于编者个人偏好的文章。比如，《寻根文学研究资料》所选《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和《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虽然是优秀论文，但很难讲是作为史料的“寻根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

第四，编选材料来源的限制。笔者曾参与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编选，负责《文学史与学科卷》^[11]。当初刚接到编选题目时，首先想到的便是，既然这是一套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就要突出“史料”，尤其要挖掘一些新史料、尽量选用反映当代文学史和学科发展的第一手材料。但很快便发现，这几乎不可能。首先，没有现成的相关史料汇编可供参考。其次，所谓反映当代文学史和学科发展的原始材料，大多出自政府部门如中宣部、教育部的文件和内部规定。这些文件规定，要么收入《建国以来重要历史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等公开出版，为一般人所易见，要么尚未解密^[12]。有几种教育部关于新中国初期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件规定，笔者通过朋友辗转从教育部档案库取得，却被责任编辑告知，不宜公开，只能从书稿中删去。还有一些限于版权，也未能收入。例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开创了编年与评传相结合的“丁易模式”，他在编写该书期间曾多次致信友人披露内心的困惑和矛盾。这些书信，无疑是从史家这个角度了解新中国初期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史料。由于始终没有联系上丁易亲属，未能获得发表这些书信的授权，笔者选编的《文学史

与学科卷》没有收入，这既是憾事也是该书的缺失。学术论文作为已发表的二次文献，收录未必要获得作者授权，收集也较方便，因此，与编选第一手材料困难重重不同，以学术论文入书，可谓简单、快捷、稳妥。这种做法导致“研究者较多注意使用公开报刊的史料，而很少有意识地深入拓展公开史料背后的材料”^[13]。

尽管以资料替代史料情有可原，但毕竟资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对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严格说只是相关研究所需要的材料，并非史料。以资料替代史料，导致许多与研究对象无关或关系甚微、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的当代文学史料缺乏整理。例如，当代文学签名本和作品发表时的编者按、稿签、稿费单等的搜集整理，迄今几乎空白。再从史料表现形态来看，有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之分，而资料一般属于文献史料。长期以资料替代史料，也导致整理出版的文献史料（资料）虽多，但重复性比较明显，很少开拓新领域、发掘新史料。当代文学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就极少得到整理。尤其当代文学编辑和作家的口述、访谈，虽然已有程度不同的开展^[14]，但是显然不够，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此类工作的紧迫性。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遑论20世纪80年代“复出”的编辑和作家，连路遥、史铁生、张贤亮、陈忠实等80年代以来成名的“青年作家”，在我们尚未对他们开展系统访谈、留下口述史料之前，已陆续离世，这是不可弥补的遗憾。

把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窄化为研究资料整理，然后窄化为作家研究资料整理，再窄化为学术论文汇编、目录索引。在互联网普及以前，惠及学界甚多。在网络技术特别是全国报刊索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日益完善的情形下，此类工作提供的论文标题和全文都能够轻松快捷检索到，其价值远不如前，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重复浪费。更甚者，不但人们对什么是当代文学史料产生误解，还导致当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牢靠的支撑。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至今仍然受到一些质疑，恐怕与此“窄化”现象有一定关系。

二 选题偏重理论研究且雷同重复严重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选题“窄化”现象，也应当引起注意。据统计，《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等九家文学研究和批评刊物在2007—2017年间所发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纯粹的“作家与作品史料”只占总数的23%，非“作家与作品史料”不但占去总数的77%，而且绝大多数是理论性很强的“从史料研究意义与价值、经典化与历史化、文学史及史料叙述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现状与问题史料”，就占了全部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15]。虽然这样的统计在时间跨度和覆盖面上存在缺憾，但是无论如何，统计结果显示的绝大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属于理论研究，是可信的，至少可提供参考，它反映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选题偏重理论研究的取向。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选题偏重理论研究，表面上体现了重视理论建设、具有理论自觉；从另一角度看，也是选题过于集中以致“窄化”的表现。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相比较，这一点更明显。众所周知，已有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以史料搜集与整理为主，在作品辑佚、版本考索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多也相当高的成绩。相比之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偏重理论探讨，而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不但数量少，也鲜有优秀成果。在中国知网上浏览已经发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论文，几乎看不到辑佚文章，考证类文章也少见。虽说较少有辑佚、考据，恰恰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区别于古代、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特点，但是从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体系来看，未尝不是缺点。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提出，与学界对此缺点的警惕和忧虑不无关系。

历史地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最大不同，应该是对理论的重视或者说具有理论建构的自觉。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是先有长期的、丰富的史料工作之后才开始，而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则是在当代文学史料工作还很薄弱的情

况下提出^[16]。一些学者鉴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过于强调实践而理论贫乏的不足,提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必须立足于理论建设,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此后特别是2014年以来偏重理论研究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可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具体的史料工作及其经验总结,所得到的理论观点与文学史料工作实践往往脱节。偏重理论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具体的史料工作缺乏理论性,“壮夫不为”,有大才华者不屑于此。选择何种研究选题,是学术期刊和研究者的自由,原本他人无须置喙,但这种对史料工作和理论之关系的理解有谬误,实在有指正的必要。“作家与作品史料”研究不到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仅“现状与问题史料”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实非正常现象。这既和大多数学术刊物和研究者不重视文学史料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也和现在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体制有关。无可否认,理论具有对问题的穿透力,能够加强论文的宏观概括,但是文献史料较少,写出来的论文没有过硬的史料支撑、说服力不够,也偏离了文学史研究的本义。何况,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等史料工作属于基础性的实践活动,没有大量的实践作基础,理论研究将陷入空洞的泥潭。亦因此故,洪子诚认为:“史料工作在视野、理论、素养、方法上的要求,一点也不比做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低。在学术工作上,这是分工,它们之间都有紧密关系,不应该厚此薄彼,独尊某一方面。”^[17]曾标举“历史分析加后现代”的程光炜,有感于“用理论带问题的研究路径”暴露了研究本身在文献史料方面的不足,自称转向“理论减法,史料加法”^[18]。

在“现状与问题史料”研究中,竟然有很多属于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意义与价值的讨论,甚至一些名家也涉身其中。有学者在《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一文里呼吁学界打破“当代文学无史料可言”的认知误区,“只有认清史料发掘的重要意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许多被历史沉淀下来的作品,我们才有治史的资本和资格”^[19];黄发有强调,“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正是当代文学这门学科

的地基”^[20];而吴秀明从学科建设的层次和角度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类似“阿基米德点”的功能价值进行定位^[21]。这应当引起注意和反思。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当代文学史料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并不是很有价值的选题,似乎没有必要反复讨论。问题是,“目前学界对当代文学史料及其研究重要性还程度不同地存在认知障碍”^[22],我们不得不“反复讨论”。类似这样“老调重弹”的选题,仍有不少。而从大家熟悉的研究选题上发现出新的历史线索和内涵,使“老问题”有新认识的文章,并不常见。纵观近年发表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论文,研究选题、研究角度雷同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属于重复研究。在中国知网、维普期刊数据库等网络平台检索篇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有6篇出自不同作者而标题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文章。在中国知网博硕士优秀论文数据库检索篇名“《人民文学》”,找到43条结果。也就是说,仅仅以《人民文学》杂志为题的博硕士论文就有43篇。这43篇学位论文当中,属于史料研究的有11篇,甚至有几篇的题目完全相同。无可否认,这些研究也有价值,能通过反复强调引起关注。问题是,在前人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新史料的开掘既难以实现,新的研究视角也难以谈起,所以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原地踏步”式的重复工作,难以产生富有学术价值和创见的研究成果。更甚者,在偏重理论、选题雷同重复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以论带(代)史”的危险。洪子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并意识到,对史料的忽视及“论从史出”的研究规范迟迟不能建立,曾引发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疏学风^[23]。

近年来,学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偏重理论、思想、观念的倾向有所纠正,当代文学研究出现向史料回归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种“史料学转向”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史料回归的趋势或“史料学转向”)“并不是从史料与学术研究本体关系思考出发做出的自然选择,而只是把史料当作逃避理论匮乏的避难所,当作思想、理论枯竭后的临时学术续命之策。”更何况,近年的史料研究还存在“拼史料”“玩史料”“堆史料”的不良现象。因此,固然要“强调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但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研究需要追求理论与史料的平衡”^[24]。已有老一辈学者就此身先示范。洪子诚不辞年迈，先后出版“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材料与注释》《读作品记》《中国文学1949—1989》等著作。有学者提倡“理论减法，史料加法”和“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着手“八十年代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吴秀明深刻地意识到史料与理论平衡的重要性，所以他一方面致力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理论建设，另一方面策划并主编多种当代文学史料书籍，借此“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25]。有一些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发现整理或理论研究，他们立足于文本细读与分析，把自己对文学概念、文学理论的理解，融进史料研究，积极开拓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选题范围。例如，金宏宇的新文学版本研究、黄发有对《人民文学》等当代文学期刊史料的研究、吴俊的当代文学批评史料整理研究、张均对红色经典小说本事的开掘、王秀涛对第一次文代会档案的整理与史实钩沉等，既有理论升华也有厚重的史料支撑。青年学者李丹“在文献阅读中发现、形成、提炼出独出机杼的选题”^[26]，对当代文学“征求意见本”现象、“大跃进”时期“群众史”写作运动等作了史论结合的论述。尽管已经出现这些良好的转变，我们仍然需要警惕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偏执于理论、选题雷同重复的研究，一般缺少与学界对话，既无视既有的成果，也不思开拓创新，长此以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很可能将自我封闭，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而导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日益边缘化。

三 研究方法偏重考据式，排斥文学批评

关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往往有两种误解，一种以为史料研究就是“剪刀加糨糊”，另一种则认为史料研究是纯粹的考据式，不包括甚至排斥文学批评。

史料研究就是“剪刀加糨糊”吗？多年前，笔者也曾经这样自问过。那一年笔者发掘整理了不少新月派散佚作品的博士论文即将参加答辩。有

人当面指责该文的学术价值不够。笔者因此一度对史料研究的价值和方法产生怀疑。随着对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逐渐深入，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即使被很多人认为最简单不过的史料搜集，其实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有学者说：“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27]此言甚是。总结前辈专家相关论述，并结合个人经验，笔者认为史料的搜集要有“四心”^[28]：首先，要“有心”，也就是要有搜集史料意识。“意识到史料的可能出处是搜集史料意识，找到史料是搜集史料的结果。有意识，不一定有结果，但没有意识，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29]只有从思想上重视史料搜集工作，才能成为这方面的“有心人”。其次，要“多心”，也就是要有“求全”“求多”的精神，全面、系统占有翔实史料。第三，是要有“慧心”，有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所谓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是掌握史料的数量，而是为了解决文学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有意识地扩大史料范围，随时注意新史料的发掘整理现状。第四，是要有“恒心”。史料搜集费时较长，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时历尽艰辛，而收获甚微，甚至徒劳无功。尤其是在当今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风气之下，史料搜集工作让不少人觉得费力不讨好。面对这些，史料搜集者必须有坚持不懈、甘心坐冷板凳的恒心。既然连最基本的史料搜集都需要有“四心”，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自然就不是“剪刀加糨糊”那么简单。事实上，所谓“剪刀加糨糊”直指史料整理工作是“笨功夫”，这就把史料整理乃至史料研究“窄化”为一种没有学术含金量的体力劳动。其后果之一，便是忽视或遮蔽史料整理过程中的史料鉴别、史实考证等，由此导致对当代作家作品做出不恰当的评价甚至误评。例如，有人批评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具有深重的原罪感，但据从事新文学版本研究的金宏宇证实，这个结论是从《青春之歌》再版本而不是初版本得出的^[30]。类似这种版本错位引发的不当论争和批评，不仅在单篇论文里时有出现，还在一些影响较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不乏其例^[31]。

再说第二种，即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窄化”为纯粹的考据式。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素来就有“史

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分立。胡适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和解释。”^[32]近些年，这两派分立的格局呈现出了向“史料学派”倾斜的趋势，于是考据式研究盛行。有学者明确指出：“如今中国大学的文学系，也很少有学者就文学论文学，大家都抱着‘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文学史实进行各种方式的考证式的研究，或基于某种时髦理论的义理之阐发。尤其考据式的文学研究如今已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研究’的最高旨趣。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没有从文学角度出发的中国文学研究，殆可断言。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以考证文学史实为荣，以写‘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为耻。”^[33]这话虽有些夸大其词，但所说大致无误。具体就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而言，不少研究者此前都曾有文学评论实践，后来转入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料研究，故而纯粹进行考据式史料研究的学者较少。尽管如此，最近几年，“为史料而史料”“为考证而考证”的考据式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且颇有风行之势，其中最常见的是突出甚至夸大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区别，将二者对立搁置。这种现象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一些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拘囿于考据式研究，要么沉浸于琐细之中，被细枝末节所淹没，缺乏一种全局性的眼光，以致当代文学史建设存在“史料研究小而碎，缺乏整体把握与整合能力”^[34]的问题；要么研究方法单一，绝不向文学批评越雷池一步。另一种是，在一些人看来，史料研究只是枯燥无趣的史料搜集与考据，缺乏文学批评的感性与灵动。例如：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并不需要太多的‘史料’来旁征博引什么”^[35]；有人指出“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限度问题”，认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充其量只能说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还远未抵达文学的核心”，也就是未能揭示文学的“审美精神”^[36]；还有人直接以“平庸之恶”来命名考据^[37]。不否认这些看法有一些道理，部分指出了考据式研究存在的问题。但从方法论上讲，文学史料研究固然以考据见长，却并不排斥文学批评，它本身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有学者早在2008年就撰文指出：“‘资料’整理不单是收集‘客观’事实”，它很大

程度上是以“批评”的方式参与了30年文学的建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30年的文学“不仅是作家创作层面上的‘三十年’，同时也是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叙述的‘三十年’，‘资料’整理就是其中一种有意味的叙述方式”^[38]。转入史料研究领域10年后，他把“史料家”提升到“批评家”的高度：“史料家不光是文学史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的眼光、素养、经验，都决定着材料的取舍，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39]吴秀明近几年致力于当代文学史料与批评的互动研究，他发现，“在现有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已初步呈现出了‘史料化批评’与‘批评化史料’这样一种既相互联系而又异同并呈的态势及路径”^[40]。洪子诚不同意“史料工作与文学批评、理论无关”的说法，认为“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41]。从某种意义说，史料搜集和整理本身就具有历史叙事的性质。作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内容之一的当代文学选本，就是一种深度参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文学批评。1981年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选编《争鸣作品选编》时，直接把选本编纂称为“开展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42]。“80年代的文学选本，在经典的确立、自由批评空间的创立、创作指导和时代精神的建构等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43]即便史料研究中似乎最不具备批评性的版本和校勘，也形成了集传统版本学、校勘学与文学批评于一体的“版本批评”和“校读法”。有学者从传统版本研究“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角度，提出了“版本批评”概念，认为“版本批评”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44]。另有学者提出“批评性的校读法”，即通过对“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努力倾听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45]，这使他的“校读法”呈现出明显的批评性与深邃的学理性。

陈寅恪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

可以真了解。”^[46]文学史料研究也“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样要有充盈、丰富、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严格说，不存在纯粹的史料搜集、整理，它与文学历史观念、与对史料的阅读理解、与现实的问题意识有密切关系。那种以为当代史料研究就是纯粹的考据式、应当把文学批评驱逐在外的看法，是偏激的。史料研究和文学批评其实不可分割。文学批评需要阅读相关史料，今日的文学批评可能成为来日的史料；具有史料意识的文学批评往往扎实厚重、学术价值更高，能够对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清晰而准确的判断。而当代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也需要感觉、经验、想象等文学批评意识的介入，它不但为文学史提供证据链上的局部、细节性史料，提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的新史料，还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学批评，“抵达文学的核心”、诠释文学的“审美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前，朱自清、闻一多力主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近年，有青年学者提出“重视史料与材料支撑的学理性批评”^[47]，也有学者表示期待“那种既能保持批评的鲜活与敏锐，又具有坚实的学术底蕴的当代文学研究”^[48]。这种将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思路，有助于纠正纯粹考据式研究的偏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升级改造考据式史料研究的思路。考据式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单个或少数几个文本，容易沦为孤立、碎片化的研究。钱穆曾严厉批评考据之弊：“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49]解决这一问题之法，便是充分吸纳、利用当代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谋求考据式研究的当代转型。

以上列举几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其目的既不是要给当前方兴未艾的“史料热”泼冷水，也不是要引起对这些“窄化”现象的恐慌。窄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常见方式。不单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窄化”现象，现当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窄化”现象。比如，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往往被人们“窄化”为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在基本就等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研究’”^[50]。就连中国文学史，也曾经被“窄化”为“白话文学史”“汉族文学史”。像这样的“窄化”，原本是学术研究常态。任何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掌握所有相关知识信息、精通所有领域，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每个方面的研究都面面俱到。常见研究者从一段时期的文学史里概括出几个主题，这样既突出阶段性特征，也方便集中力量开展研究。然而，划分阶段性主题往往意味着遮蔽主题之外的部分。例如“伤痕文学”这个主题以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滥觞。其实，在1978年的“地下刊物”《今天》杂志那里就已经有伤痕文学。再如，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创作，很难说属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王小波的文学创作没有和体制内的任何文学活动及创作思潮发生过关系，不属于几个阶段性主题的任何一個，结果直到今天，王小波的作品没有得到历史性的评价。回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看来我们必须讨论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它的“窄化”现象？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窄化”也不例外。窄化可以使我们的思维集中。没有窄化，可能导致思维涣散，对当代文学史料的认知缺少见解，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过程中缺少原则的约束、观念的引导。没有窄化，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将是一团庞杂无序的乱麻。但是也要注意，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降低了史料广泛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机会，研究者可能因此变得眼界窄小，或沉溺于固有的史料。对于研究者来说，窄化的弊端在于：它使得研究者只能接触到某方面的特定史料，即只能接触与研究“固定成见”相同或相近的史料，而忽视或撇弃与其相左的史料。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其实是一个建立和丧失的过程，偏执于某方面、某领域则意味着遮蔽或忽视另一方面、另一领域。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握好窄化的“度”。适度的窄化使研究者注意力集中，专注于某一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现象，能够对这些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适度的窄化”？如果被窄化的对象是对当代文学有益的，或者是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所必须的，那么应该警惕这种“窄

化”，积极发展被其忽视的部分；反之，如果被窄化的对象是不必要的或者不是当代文学研究所需要的，就可以听凭其“窄化”。

行文至此，笔者现在倒是又担心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种“泛化”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下，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优于其他研究（比如文学批评）。因为这种优越感，有人以史料多寡来评判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优劣；有人追捧秘密史料、陌生文献、稀有史料等“新史料”；有人依据单篇或几篇新发现的史料，写翻案文章，置学科常识和共识于不顾；还有人把那些质疑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声音视为异己而加以严厉抨击。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虽然史料整理与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基础和前提，但它很大程度上“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不能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全部和终极目标。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各有不同责任和使命。我们固然反对把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视为单纯的考据式，但也不主张将丰富多样的文学批评都引向和纳入史料的阐释体系，而是要在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交融的前提下，各有侧重。就此进一步而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该有“泛史料”的意识，彰显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格局。我们最初面对一种文学史料时，应当无功利、无等级、无新旧、无雅俗、无地域、无民族、无意识形态的偏见。这样，我们将像新生儿那样，用诚挚而纯真的眼光打量文学史料，发现一切都是全新的，对文学、对社会、对世界充满新奇和热爱。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很难做到，但有理想、有目标，就有希望。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验、感悟文学之美。毕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是文学之美的窄化，而是让文学之美更加灿烂绽放的过程。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通论”（18JHQ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近年召开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学术会议有：2013年11月16日至17日，《文艺研究》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杭州联合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2016年6月6日，东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2017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研讨会”；2017年12月9日至10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2018年9月15日至17日，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坊等。

[2] 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2019年第9、12期、2020年第1、6、7期。

[3] “窄化”，百度词条搜索，2016年8月9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窄化/2523820>，2020年8月26日。

[4] 《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

[5] 吴秀明、章涛：《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基于现有成果的一种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

[6] 张福贵：《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7][10] 程光炜：《总序》，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朦胧诗研究资料》，第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8] 吴秀明：《整体性视域下的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兼谈“年代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9] 参见《编辑说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1962年5月。

[11] 付祥喜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文学史与学科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 洪子诚、程光炜、吴秀明等都曾提到面对“带有很强的保密性质”的当代文学档案“藏而不宣”的无奈。

[13] 谢泳：《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以1951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为例》，《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14] 例如：《新京报》推出的专题访谈《追寻80年代》，查建英推出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程光炜在《长城》主持的《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等。

[15] 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 [16]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科学:起点与机遇》,《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 [17][41] 王贺采访、整理:《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 [18][39] 程光炜、张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程光炜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 [19] 丁帆:《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 [20] 黄发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 [21][22] 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 [23] 洪子诚:《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 [24] 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新平衡》,《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 [25] 吴秀明:《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 [26] 吴俊:《我看李丹》,《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 [27] 夏晓虹:《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与使用》,《名作欣赏》2018年第16期。
- [28][31] 参见付祥喜《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第65—68页,第213、215、239—2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 [29] 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第6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30] 金宏宇:《对知识分子的改叙——〈青春之歌〉的版本变迁》,《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 [32] 顾颉刚编:《古史辨》2,第3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33] 郜元宝:《“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 [34] 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 [35] 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 [36] 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渡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 [37] 旷新年:《由史料热谈治史方法》,《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 [38] 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 [40] 吴秀明、史婷婷:《批评与史料交融及其实践的主要路径——基于数据的考察与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 [42] 参见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争鸣作品选编》,前言第1页,内部资料1981年12月印刷。
- [43] 参见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内容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 [44]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32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45] 祝宇红:《读解志熙〈考文叙录〉》,《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 [4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 [47] 刘艳:《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来谈》,《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 [48] 张桃洲:《由批评而学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新确立》,《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 [4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国史大纲》(修订本),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50]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艳